

# 许世友秘书回忆性情将军真实一面

世人传说许世友办公桌上放着一把手枪,谁进门不报告,他甩手就是一枪,曾经打死过好几个老婆。这是谣传

## 被残酷环境所拆散的结发妻子

许世友一生结过三次婚,在战争年代复杂残酷的环境下,他的三任妻子,或散或离或白头偕老,没有一个是因为进他的办公室不报告而被他打死的。

许世友的结发妻子叫朱锡明,和许世友是老乡。朱锡明1901年生,比许世友大四岁。贫苦人家出身的朱锡明,勤劳、能干,又天资丽质,早被许世友的母亲看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母亲的操办下,许世友按照家乡的习俗,雇一顶简陋的花轿和几个吹鼓手,把朱锡明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

许世友的蜜月只过了三天,就接到作战命令,告别了母亲和新婚的妻子上了前线。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许世友只能偶尔在更深半夜回家与妻子小聚。

后来,许世友参加了黄麻起义,随队伍撤离开了家乡,再后来,随红军长征队伍到了陕北。许世友和朱锡明共生了三个男孩,前两个都夭折了,第三个男孩叫许光。

许世友离开家乡后,音信全无。后来,家乡传说他在战斗中被打死。为了不让她儿媳独守空房,深明大义的许母左劝右劝,最后自作主张,把朱锡明改嫁给了一个老实本分的庄户人家。而许世友随部队出征不久,就听到了反动武装对革命家属进行疯狂报复,母亲被迫离家逃难,妻子和儿子被杀害的传言。因误听传言,许世友后来重新组织了家庭。

花开花落,春去秋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许母的头发全白了,老人家盼儿子的心也死了,她不再幻想许世友能活着回到她身边。就在这时,全国解放了,许世友作为山东省军区的司令员,他的名字登在了报纸上。

朱锡明得知许世友还活着,不禁悲喜交加。喜的是自己日夜思念的亲人还活着,悲的是自己已另嫁他人。后来,许世友把母亲接到济南居住,每当老人向许世友提起儿媳朱锡明如何孝顺贤惠,如何遵从婆婆之命改嫁他人的往事,许世友就会唏嘘不已。

## 受“张国焘路线”牵连而分手的第二任妻子

许世友的第二任妻子叫雷明珍,四川达县人,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雷明珍好学上进,工作大胆泼辣,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延安县担任妇女部长。

许世友到达延安不久,便对雷明珍产生了好感。经人介绍,两人相知相爱,在延安举行了婚礼。婚后,两人互敬互爱,感情很深。细心的雷明珍还把部队宰羊后丢弃的羊毛收集起来,搓成毛线,给许世友织了平生第一件毛衣。

天有不测风云,没料到许世友和雷明珍的这段美好的姻缘,却因为许世友在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中受到牵连和雷明珍一时的冲动而散伙了。

1937年初,许世友所在的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从保安迁到延安。抗大在清算“张国焘路线”时,一度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把红四方面军在抗大学习的高级将领,与张国焘的错误联系在一起批判。把红四方面军的学员,一个个整得灰溜溜的,抬不起头来。许世友对此倍感委屈。

“此处不留客,自有留客处,我们走!”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许世友,此时竟然萌发了串联在抗大学习的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秘密出走,回四川打游击的错误想法,并在暗中作准备工作。事情败露后,许世友等红四方面军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关了起来,并被戴上“组织反革命集团”、“拖枪逃跑”、“叛变革命”等罪名。许世友感到天大的冤枉,但又觉得“浑身长嘴也说不清楚了”,他把一切看得很灰暗,只求一死了之。此时,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妻子雷明珍,他托人给雷明珍捎去口信,要雷明珍赶快来看他一面,他要为不能陪妻子白头偕老而当面致歉。

口信捎出后,许世友日思夜盼,盼来的却是雷明珍的一封信。信上说:“许世友,我恨你,我绝不爱一个反革命分子,咱俩的事情一刀两断,我坚决要求离婚,请你签字!”

许世友看完信,顿感五雷轰顶。他怎么也想不到,在自己落难需要向亲人倾诉之时,心爱的妻子竟是如此绝情。这在许世友这位刚烈的汉子心灵上,留下了一生都难以抚平的创伤。

后来,毛泽东亲自纠正了“批张”扩大化的错误,许世友幸免于难,并重新带兵打仗。雷明珍对自己一时冲动而做出的草率决定追悔莫及,她多次找许世友承认错误,希望复婚,可许世友不肯原谅她。雷明珍后来又请朱德、陈赓、陈锡联等许世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出面调解,但许世友最终没有原谅她。

## 相携一生的田普

许世友的第三任妻子田普,是山东莱阳人,他们相识相恋在抗日烽火年代。田普1922年生,比许世友小17岁。他们真正一对对琴瑟和谐的患难夫妻。两人1941年结婚,相依相伴四十四年,育有两子四女,白头偕老。

#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在炼丹的过程中,以黄豆汁培育丹苗,豆汁偶与石膏相遇,成了豆腐。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过亚洲,走向世界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

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的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销,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是从国内找来的。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

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

据说,只要孙中山方面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

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

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

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

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

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据《无所畏与无所谓》张鸣/文)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考试自隋朝始至清朝终,这个古代的“高考”更是令人纠结,多有失意者。

这些失意者大致分两类,禁考和落榜。禁考即被剥夺了考试资格,任你天下第一,朝廷不带你玩,“起跑线”上没你的位置,奈何?大诗人李白,就是禁考的受害者。据说,被禁考的李白,出身颇有些不清楚,其先祖乃流放西域的罪犯;再者,李白的父亲是商人,且涉嫌不法。按唐朝律令,罪犯和商人的后代,绝对不能参加“高考”,李白也不能幸免。这种禁考令将很多人拒之门外,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李贺,因其父名晋肃,“晋”与“进”同音,于是李贺为避父名讳不举进士,即不能参加

“高考”。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年轻的李贺由此郁闷寡欢,26岁就故去了。

唐朝另一位大诗人杜甫,“高考”的命运则与李不同,李是不许考,杜甫是没考上。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杜没有才华,“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另一个角度看,虽说也有不少文学家出自科举考场,但那毕竟是为朝廷培养官员的地方。也有一次考不上继续多次参考的

杜甫李时珍黄巢洪秀全……

# 盘点古代“高考”落榜生

落榜生。唐朝诗人张继便是如此,那首流传千古的《枫桥夜泊》就是在落榜之后写成。这似乎是一种反作用力,后来张继终于考上进士,算是范进中举的一个“正能量”版本。

在落榜生里,杰出人才比比皆是,除了李白、杜甫、李贺之外,像贾岛(屡举进士不第)、柳永,写小说的冯梦龙、蒲松龄、吴敬梓等等,都是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人物。著名中医学家李时珍也是落榜生,他曾三次赴考,均失

意而归,于是他放弃科举做官之念,笃志学医,完成了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药理学巨著《本草纲目》。

还有些落榜生,别看考试成绩不佳,却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甚至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比如黄巢,屡试失意于考场,那首《不第后赋菊》就是在落榜后写的。同是落榜,张继选择了复考,黄巢却没有那么好脾气,索性揭竿而起,“我花开后百花杀”了。有意思的是,曾经考上进士的优秀生皮日休,居然成为落榜生黄巢手下的幕僚。

清朝是科举制度依存最后一个朝代,在这个末世,出了一位比黄巢还有影响的落榜生。倘若考场过关,此人可能会当个小官,按部就班地混日子,近代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遗憾的是,历史没有可能,这位考生屡试科举不中,便如他的前辈黄巢一样,聚众造反了,此人便是洪秀全。倘若以科举来划线,太平天国骨干洪秀全、冯云山、陈326723,其车辆购置附加税完税证明(证书:11411633420),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张才涛的豫S2B085号小型轿车,车架号:770476,发动机号:CB326723,其车辆购置附加税完税证明(证书:11411633420),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中视高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副本不慎丢失,证号:411502000004027(1-1),特声明作废。

信阳中视高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7日

●兹有方军的河南省烟草专卖检查证(编号:41T339)和河南省烟草专卖执法证(编号:豫N39-0280),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兹有信阳市景福堂大药房光山分店行政公章壹枚,因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 通知

信阳技师学院(信阳高级技工学校)卢建平同志:根据《信阳市财政供养人员“吃空饷”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意见》(信纪发[2013]12号)文件精神,请于本通知见报之日起十日内到单位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未归,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特此通知

信阳技师学院  
2013年8月27日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十九,一次影响了整个中国历史走向的长达整整两个月之久的集体决策在北京紫禁城里拉开了帷幕。

**决策背景:**18天前,正月初一,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11天前,正月初八,李自成统大顺军主力由西安出发,开始了向北京的最后进军。而此时,北方的明军已经被李自成基本扫荡干净,最后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是吴三桂指挥的数万辽军,正在镇守山海关外仅剩的重镇宁远,抵御着明王朝另一个强大的敌人——满清。

**决策者:**主要领导崇祯皇帝,参与者明朝群臣。  
**决策总议题:**国破山河在,如今怎么办?

## 决策议题一:要不要调吴三桂部进关勤王?

这个问题其实答案是很清楚的。除了吴三桂部,明朝在北方根本无兵可用。如果连北京都失去了,王朝都灭亡了,对明朝而言,守着宁远又有什么意义?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但丢掉了这么多土地和人民,谁来负责呢?这才是这次集体决策的第一个焦点。

首先是领导发言。崇祯一开始试图在责任问题上彻底装糊涂,说只要调吴三桂和他最精锐的五千骑兵进关就可以了,关外“余兵尚多”,未尝不可以支撑局面,因此不存在什么失地弃民的问题。同时他又示意大臣们主动承担责任,说“此等重大军机应行与否,原应先生每(们)主持担任,未可推诿延缓误事”。

然而,大家谁也不傻。吴三桂部虽然名义上有数万之众,但其中真正的核心力量也就是那五千精兵。主帅走了,精锐走了,人心动摇了,剩下那些滥竿充数的杂兵哪里还能守得住住城?别看皇上现在在这里打马虎眼,把问题说得轻描淡写,一旦出了事,这些“主持担任”的先生每(们)可就难逃其咎了。

于是,首辅陈演当即冠冕堂皇地声称:“一寸山河一寸金,锦州告急,宁(远)兵万不可调。”在随后的回奏揭帖里,大臣们又说:“倘(吴三桂部)一旦调去,其余皆分守各城堡之兵,未必可用也……万一差错,臣等之肉其足食乎?此真安危大计,臣等促膝密商,意旨如此,实未敢轻议也……臣等迁愚无当,诚不敢以封疆尝试,伏乞圣裁!”一脚把球踢回给了崇祯。而最终把这层窗户纸揭穿的,是兵部尚书张缜彦,他说:“三桂之调不调,视宁远之弃不弃,两言而决耳。”

眼见马虎眼打不了了,崇祯只得硬着头皮做出了决策:“收守关之效,成寇寇之功,虽属下策,诚亦不得已之思。”这时已是正月下旬,李自成主力已经渡过黄河,深入山西境内。

可是,尽管领导有了倾向性意见,但集体决策的程序还没有完,责任仍没有完全撇清。首辅陈演为了把责任推个一干二净,再次召集更多的大臣廷议,意在分担责任。廷议通过后,他还不放心,要继续扩大集体决策的范围,要求“请行督、抚、镇再议宁远弃后关门作何守法?军民作何安顿?总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就差没搞个全民公决了!也许是这种推卸责任的想法也正中崇祯下怀,他竟然也同意了这个荒唐的意见,下旨“差官前去,及取回奏”。地方督抚分处各地,文书信件一走就是好几天,来来回回,决策程序是彻底没完没了了。

可是,李自成是不等人的。三月初六,大顺军主力已经连克宁武、大同,进抵河北宣化,奔居庸关而来。崇祯这才终于坐不住了,不再“集思广益”,下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并要求他放弃宁远入京勤王。然而,你们这些决策者的责任总算扯清楚了,人家执行者的责任可还没弄明白呢。你是让吴三桂放弃宁远,可没有让他把关外几十万老百姓都扔掉吧?若是吴三桂自己带精兵昼夜兼程入关,而导致老百姓或是后卫辐重被清兵追杀受损的话,谁知道北京解围之后会不会有人跳出来告“平西伯”一状呢?于是,吴三桂慢慢悠悠地收拾行装,三月初十才带着几十万军民缓缓离开宁远,而且是亲率精兵殿后,保护百姓辐重万无一失,每天行路不过50里。等到三月十九李自成进入北京的时候,吴三桂才刚进山海关……

## 决策议题二:要不要把首都南迁?

当然,要说崇祯和明朝群臣只知束手待毙也是不客观的。就在为要不要吴三桂进关一事“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之际,他们也在同时讨论另一个备用方案,即要不要把首都南迁。

应该说,与困守孤城相比,南迁对崇祯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出路。当然,南迁之后可能会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但这总比亡国好?因此,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回答。可是,一旦要决策,涉及责任,问题就又来了。虽说南宋比亡国强,但毕竟当年南宋也很不光彩啊!谁来当宋高宗?谁来当秦桧呢?聪明的人们很自然会想,最好是别人来当,我不但不当,而且还要“义正辞严”地痛斥他们一顿,显示出我的“傲然风骨”,然后再万不得已被他们“裹挟”而去……一个人这样想,可能确实是好主意,可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想呢?

第一个这样想的就是领导本人。其实早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就动过这个念头。虽说早有此意,但皇上自己是万万不会做宋高宗的,他“恐遗恨于后世,将俟举朝固请而后许”,坐等有人出来当秦桧。

可是,在连放弃个小小宁远的责任都没有人愿意承担的朝廷上,又有谁愿意来当秦桧呢?面对南迁之议,大臣们一个个唯唯诺诺,就是没有人敢说放弃北京的话。应该说,在明哲保身方面,明朝的大臣们是强中更有强中手。终于,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想出了一个高招——皇上可以坚守北京,而自己愿“愿奉皇太子南去”。这一招着实把崇祯憋了个半死——北京丢了,自己送死,儿子当皇帝。北京不丢,也是孤城一座,毫无实力,儿子分分钟可以效仿当年唐肃宗,自己在南京称帝。而不论哪一种情况,这帮大臣都一点事没有,不仅不承担丢失北京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拥立新皇帝、再造社稷的大功臣……这不是开玩笑吗!崇祯皇帝带着肚子怨气,愤愤不平地说:“朕经营天下十几年尚不能济,哥儿们孩子家做得甚事?先生早讲战守之策,此外不必再言。”比李建泰更强悍的是给事中光时亨,他慷慨激昂地大骂“李明睿南迁为邪说”,坚决要求死守北京,俨然是当年李纲、于谦再世,要跟这些新时代秦桧势不两立。

有这样的“忠贞之士”在朝,还有谁敢当宋高宗、秦桧?于是南迁之议与吴三桂进关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议而不决。直到二月底、三月初,大顺军南路刘芳亮部沿河北岸进军从南面包抄北京,切断了崇祯南逃之路,才帮助明朝终于完成了这次集体决策,崇祯在绝望中哀鸣道:“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决,无复多言。”

一次精彩纷呈的集体决策就这样结束了。故事的结局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晚,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把自己挂在了皇宫后面煤山的一棵树上。貌似在这次集体决策中崇祯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其实也不见得,他至少成功做到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亡国的责任推了个干干净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而后世居然还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这一点。他之所以落到这样一个可悲的结局,只是因为他不巧自己是大老板,从而在没有责任的前提下还不得不委屈地承担全部后果而已。

这次集体决策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是极为深刻的。决策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明末腐败堕落的官场当然不能辞其咎。“明季士大夫”是著名的“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只知道八股教条和党同伐异。遇到利益就上,遇到责任就退,是他们的座右铭。在上述集体决策过程中,这些士大夫们的种种丑闻,已暴露无遗,无需再赘述了。

然而,要与大臣们负同等责任,甚至更大责任的,是崇祯皇帝本人。尽管官场黑暗,但明朝原本也不是没有敢担责任的,只不过这些人承担责任的勇气都让崇祯给打压下去了。俗话说“上行下效”,崇祯作为最高领导,带头推卸责任,不敢决策,拉着帮大臣来集体决策,替他背黑锅。他又怎么能怪手下那些大臣一个个向他看齐,也来推责任,拉更多的人来一块集体决策呢? (据《学习时报》张剑锋/文)

## 公告

陈书同志:  
你自分配到我单位,长期脱岗,无故旷工至今,且无法联系,按上级清理“吃空饷”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请于2013年9月15日前回单位报到,逾期未到岗视为自动离职,单位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特此公告  
信阳市浉河区卫生监督所  
2013年8月30日

更多超值优惠  
炭烧体验  
欢唱热线: 0376-6256111 6256222  
地址:信阳市北京路金杯财富大厦  
(体彩)场汉口公馆隔壁)